

从科学的性别文化到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科学文化

易显飞¹, 常红¹, 曹志平²

(1.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4; 2.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传统女性主义从性别维度分析传统科学文化,揭示出传统科学文化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与科学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受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新时期女性主义解构传统科学文化的一元结构,从阶级、民族、地域等方面坚持科学文化的多元立场,女性主义科学文化观从科学的性别文化转向了科学文化的多样性研究。后现代主义对女性身份的消解与后殖民主义对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强调为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发展带来新动力与巨大挑战,唯有建立一种使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多元主义的差异与女性主义批判完美结合的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多元文化才能继续发展。

关键词:科学文化;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G321.9;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1)02-0012-06

From Gender Culture of Science to Diversity of Science Culture

——the Scienc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YI Xianfei¹, CHANG Hong¹, CAO Zhipi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science culture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Based on gender analysis, traditional feminism holds that there ar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Phallus Centrism” of science culture views in traditional science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m, the new feminism deconstructs traditional monistical science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holding that science culture is plural in such aspects as classes, nations, regions and so on. Thus, the study of science culture views turn from gender culture of science to diversity of science culture. There is doubtless that the study will keep developing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new theories in future.

Key words: science culture views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diversity of culture

传统女性主义在建构论的理论基础上,试图通过对科学性别维度的分析,揭示出传统科学文化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与科学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新时期女性主义科学文化观则认为,不应仅仅从性别维度分析传统科学文化,“不能因社会性别范畴的普遍运用而塑造出这样一种自然假定——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研究唯一关键的理论视角”^[1];科学文化应该是“情境性”与“选择性”、“权力性”与“多元性”融合一体的多样文化;传统的科学文化实质上是欧洲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新时期女性主义持一种阶级、种族、地域融合下科学文化的多元立场,试图建立一种女性主义多元科学文化观。进入21世纪,多元主义与西方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等新兴理论以更显眼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线,女性主义必须与这些新理论、新概念携手共建新世纪女性主义科学文化观。

一、传统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科学文化——“菲勒斯中心主义”性别文化

传统女性主义以科学与性别的相互建构为突破口,从性别维度分析传统科学文化,揭示出传统科学文化的核心概念——“理性”与“客观性”的男性特征,以及科学文本中存在的性别隐喻及其对女性的歧视,阐释了传统科学文化是“菲勒斯中心主义”下的性别文化。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①与性别建构理论^②是女性主义科学观的重要理论基础,针对传统科学进行性别维度的分析及女性主义科学性别文化观向女性主义科学多元文化观的转变,都是在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基石上,随着身份认知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

“性别和科学都是社会建构的范畴,这是对性别与科学进行反思的两大前提”。^{[2]3}承认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作为一种制度体系、一种话语结构、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系统,对科学的建构作用才可能被研究。承认科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才能考察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互相影响与建构。科学是社会、历史、文化共同建构的,性别作为一种文化或社会因素也参与了科学的建构。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凯勒所指出的,“科学是我们对于特定群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及其描绘的知识整体的一个命名,它不仅是指那些由逻辑证据和实验证实的苛刻要求来定义的内容。女人、男人和科学都是在相互交织的认知、情感和社会作用力的复杂动态过程中被一起创造出来的”。^{[2]3}同样的,只有承认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体制、一种权力系统,对性别的建构作用才可能被关注,性别才可能摆脱生物决定论的束缚,参与到科学中来,揭示出主流科学的男性气质化以及科学对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说明与塑造。也只有承认科学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建构,才能更好地理解、研究女性主义科学观及女性主义科学文化。

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科学文化所强调的理性是男性的理性,西方思想史从一开始就把理性看作一种男性的特征,认为男人有能力投身于理性的科学事业,科学事业更多的表现为男人的事业。女性主义学者吉纳维芙·劳埃德在《理性的人》中,追溯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理性理想的历史,得出结论:“理性被构想为是女性特征的超越。”^[3]科学文化从一开始便打上了“男性”的印记,在女性主义看来,科学文化的历史是追求理性的历史,也是超越女性特征的男性文化历史。

女性主义科学文化批判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科学客观性的男性特征。与“客观性”紧密相联的两个概念是“主观性”与“价值中立”。女性主义首先撕下“价值中立”的假面,认为“价值中立”是科学研究中男性压制女性的遮羞布,强调“价值中立”是男性价值观的谎言。女性主义认为,所谓“价值中立”、“性别无涉”的纯粹

①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源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对现代性和科学的反思与批判。1960年代,后现代社会理论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系统、道德政治观念、语言体系和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反思,认为以往所有的社会理论以及与之相连的思维模式、推理逻辑、语言策略、真理标准和道德规则,都是现代社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参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刊发的章梅芳所撰《性别与科学的社会建构——试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文第96页。后现代对传统的全面反击给传统科学观以重重一击。同一时期,以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批判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真理观,认为科学知识不是真理的表征,只不过是—种社会建构的叙事和神话。19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这一学派认为,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并非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科学知识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是社会建构的产物。1960年代,女性主义在对性别的社会建构的研究中,引入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从性别维度对传统的科学观进行批判,试图建立女性主义科学观并形成女性自己的科学文化。

② 女性主义最引以为傲的贡献就是,发现或建构社会性别,并将其应用到科学观的分析中。试图从性别维度出发,建构没有性别歧视的“好科学”。1960年代末以后,女性主义学者普遍认识到,女性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因素决定,而是社会文化不断规范的结果。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反应中形成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行为也是在社会文化制约中培养起来的;生理状况不是女性命运的主宰,男女性别角色是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得到改变的。参见《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王政所撰《“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析》一文。由此,女性主义区分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两个基本概念,而“社会性别”被认为是由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赋予女性和男性的一套属性,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男女差异及地位不是生物力量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社会性别是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的,每个人都有意无意的创造着性别。

科学只不过是父权制文化从封建教会时期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一种观念上的人为建构,并不具有建构者所认定和宣称的普遍性,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4]并进一步揭示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男性气质是由主客两分思维方式造成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男性气质的形成,指出“客观性是心理自治的认知对应物”,并从历史、心理学和科学实践等角度解构了传统的科学客观性神话,认为这种客观性以主客体完全分离为前提,以忽视情感、关系和爱为代价,宣扬了以理性、分离和控制为基调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

传统科学文化之所以被女性主义称为男性中心文化的另一表征在于,科学文本中存在大量的性别隐喻,这种性别隐喻可追溯至近代科学之父培根。培根认为,“自然本身要成为新娘,她需要科学的头脑去驯服、形成和征服”。^[2]培根将科学看作男性,将自然看作具有需要揭开面纱和穿透的神秘性的女性。生产知识是一种侵略行为——被动的自然不得被拷问、揭去覆盖物、刺入、穿透,被强迫显示她的秘密。^[2]把自然比喻为女性,自然知识的生产就可解释为具有性寓意的过程。她或者需要被劝诱,或者需要被强制放弃挣扎,让自身的秘密被刺穿。知识的获取是一种对女性自然的英雄式的征服过程,知识的追求者必然被认为具有某种男性气质。科学文本中的隐喻作为一种科学语言,常常以强化既有文化统治权的方式去阐释科学。而科学文本中的性别隐喻所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解说方式,而是将波及经验数据的搜集,以及所有重构或生产知识的过程。

针对科学中的性别隐喻,许多学者抱怀疑态度。在专门针对后现代科学观的批判著作《沙滩上的房子》中,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格罗斯(Paul R. Gross)对性别隐喻进行了反驳,女性主义所引用的那些隐喻性内容中,很多是研究者的杜撰;以往的研究并不带有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发生生物学的知识完全不依赖于隐喻。然而性别隐喻在多大程度上建构了科学的内容,仍将是女性主义未来研究的主题。

传统女性主义派别林立,女性主义理论纷呈并杂。有人甚至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随着男性大师的理论脚本起舞”的拿来主义——有多少种主义,就有多少种女性主义。这种看法指出了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然而传统女性主义各派别的努力却并未形成多元的科学文化观,性别文化向文化多样性转向的研究有待新时期女性主义新派别的努力与推动。

二、新时期女性主义科学文化观——多元主义科学文化

受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新时期女性主义^①将科学知识定义为“情境性”与“选择性”下的知识,认为传统的科学文化是欧洲文化,是“地方性知识”。她们持一种阶级、种族、民族、地域融合下的文化多元立场,主张运用“非线性思维”研究科学文化的多元性。

后现代主义^②反对普遍性、总体化、同一性、本质论、基础论、等级体系和中心主义,肯定多元化、差异性、非中心主义、零散化、不确定性、流动和生成。女性主义运用后现代“解构”这一分析工具,质疑传统一元科学文化及传统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分析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探索二元范畴中的权力关系,揭示了学术和知识中的政治社会因素,为非对立范畴的边缘思维方式打开通路。同时,追随后现代主义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化,反对权威,张扬感性生命的理论旨趣,促进了女性主义自身的多样性发展,为女性主义多元科学文化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知识是情境的,是选择的结果。科学文化具有“情境性”和“选择性”,知识不过是选

① 新时期女性主义主要指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

②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西方国家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反传统哲学文化为特征。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科学文化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下形成的统一性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它模糊社会领域多元分化性质。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理性思想的抽象性和权威性,反对传统知识绝对基础的必要性,主张用真理的多元定义来取代启蒙运动的单一定义,支持局部类型的、以历史为具体环境的、语用类型的知识。

择相信的故事而已,它来源于社会物质世界中的权力力量对比。从这种力量对比中,可以看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等的影响。而科学研究的过程及其成果是取决于实验室的物质情境和社会情境的权宜性的选择。^①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种情境主义认为,知识依赖于情境,依赖于其得以产生的实验室条件和方法,同时也内在地包含着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价值观和认知假设等。这种理解与意识或价值观依赖于其所属群体的知识结构、情感经验和意识形态等,他们以某种方式涉入了研究过程,其结果必然是与具体情境相关的。同时,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情境的。这种科学文化情境性的结果与选择性的前提就是科学家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及科学知识的文化多元性。

对知识的社会情境性与多元性的强调还源于后现代主义强调赞成的“非线性思维”——一种超越理性和逻辑、与直觉和主观体验密切相联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线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单向逻辑思维,暗含着男性所特有的征服、压迫、统治。启蒙认识论所包含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大叙述”是以唯一真实的故事来说明整个世界的认识论,就是在这种男性“线性思维”下形成的一元文化的代表。非线性带有相反的解放的含义,暗含多向性思维、界限含糊的直觉思维,这种思维下的科学文化也必须是多向性与多元性的。“非线性思维”形成的科学文化观质疑理性提供的客观、普遍的基础,反对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所强调的科学一元文化论,提倡科学知识 with 科学文化的多元性、流动性。

后殖民主义试图解构西方中心、西方标准,着重阐明西方宗主国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实质,揭示西方的思想文化是通过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来支配世界文化并将非西方的传统文化边缘化,予以排斥。在此影响下,后殖民女性主义从边缘立场来分析欧洲文化的“地方性”,认识到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的内在相似性——处于边缘、从属的位置。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展开了频繁的交流与对话。^[5]

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文化的首要特点就是将其女性主义理论置于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之中,批判欧洲文化的“殖民性”与“地方知识”特征。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试图改变欧洲科学文化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改变欧洲科学文化自以为是、自我建构的状况,放弃“有权就有理”的文化模式。后殖民时期的科学文化研究从欧洲中心文化之外确立其关注对象和概念框架,这种转移中心关注的科学文化研究是科学的定义更具包容性,“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在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下,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哈丁认为,后殖民主义科学文化研究的这种策略使其能够探究不同文化下的科学特征,不仅可以为原有的概念框架添加新的研究主题,还能迫使概念框架本身发生变化。^[6]也可以较全面地辨析与科学有关的文化资源的优势、界线和局限,将多样性、地方性的知识资源更多地吸收到科学之中去,推进科学的创造,推进民主社会关系的建立。

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文化的另一特点就是坚持科学在文化上具有多元性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后殖民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科学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文化信仰体系,而非个人品质;是社会、制度和文化或哲学的男性中心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的例证,而非个人“偏见”。后殖民主义批判元素的加入使女性主义批判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从单一的性别偏见研究扩展到对性别与阶级、种族、民族、文化、地域等相互融合的思考,更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知识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共建,及在制度与世界观上的体现。后殖民女性主义结合了女性主义思考与对殖民体制的批判,在承认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要素的同时,将性别问题放在民族、种族、地域甚至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中,探讨不同情境下性别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与建构,反对性别的同一性、均质化,揭示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多元多层次性,关注跨文化的性别差异

① 如实验室里存在的常见的情境因素:仪器设备、测量装置、期刊和书籍、技术人员、提供常规服务的机构或便利条件,以及是否容易得到经费等,这些情境因素体现于科学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在不同的情境中,同一个科学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并因而建构出不同的产品。

性,强调科学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与相互协调发展。

新时期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推进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多样性研究的同时,也给女性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消解使女性主义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传统女性主义费尽周折将妇女扶上主体位置,后现代主义却宣布女性主体的退隐。如果女性的概念受到质疑与消解,那么,与之相对立的男性也不存在。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解构主体的同时,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奋斗目标。“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验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权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权主义的政治。”^[7]女性解放的事业就无从谈起,科学多元文化研究面临挑战。

后殖民女性主义反对女性主体的本质主义诠释及性别压迫的单一性解释,强调差异和多元化,认为妇女的性别压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情形下是有差别的;女性主体不仅受性别的影响,还受种族、民族、阶级等因素的制约。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的多元文化体现在对差异性、异质性的重视,主张以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因为不同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异。但是后殖民女性主义致力推进的多元文化并不能保证其所追求的社会公正性,后殖民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研究面临着挑战。

三、女性主义性别新进展对多元文化挑战的回应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女性概念的消解与多元文化研究的困境,女性主义作出了回应。她们认为,对女性多样性或差异性的研究并不阻碍将女性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没有必要解构女性概念,保留女性研究既是必需的,也是合理的。^[8]她们承认所有的妇女都面对着一个公共压迫结构,但是这一公共压迫的内部则是断裂的,因为压迫会由于种族、民族、年龄、阶级、性倾向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女性差异中包含了相同性。这一策略使女性主义避开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消解,得以对女性特质、女性意识、女性身份等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试图重构一种“女性的”但并非与“男性”相对立的叙事逻辑,颠覆二元对立的模式本身,追求相互包容的多元逻辑。

在多元文化和后现代背景下,女性主义抛弃了铁板一块的女性概念,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将社会性别的考察置于具体的文化和历史中,社会性别的变化意义是在同这一系列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9]强调社会性别或女性身份的差异性、历史性和情境性,要求在非西方的性别文化与境、科学与境下考察性别问题及其特质性。正如哈丁所言,对科学与性别问题的研究必须注重与境,必须放弃“普遍的”或“本质的”女性概念,必须认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性别关系,而只有被阶级、种族和文化建构并与之相互塑造的性别关系。^[10]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关系的抽象“女性”概念,反对将不同种类的妇女作普遍性的推测和概括的理路,必须承认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呼唤人们注重女性内部千差万别的经验,对女性身份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在特定语境及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生成不同的女性话语和女性身份。

后现代主义对女性身份的消解带来的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新发展,为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多元化的立场批评欧美女性主义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代替所有妇女的经验,对妇女内部存在的差异视而不见。^[11]黑人女性主义、底层话语、同性恋研究理论等多元理论齐头并进的形势彻底打破了欧美女性主义单一声调、单一逻辑的叙事局面。

黑人女性主义强调从女性与阶级、种族、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对社会性别概念进行拓展研究,反对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或一个稳定的分析概念加以利用,反对将女性看作是同质的。“女性被假定为一个已被建构了的一致的团体,有着相同的利益和愿望,而不管其阶级、种族或人种的具体差别,这意味着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跨文化的性别或两性差异、甚至家长制观念。”^[12]黑人女性主义要求从性别与民族、种族和

阶级的关系中探讨女性问题,因为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除了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民族和种族。^[13]

性别研究新发展——“酷儿理论”^①是199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由男女同性恋者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综合发展而来。“酷儿理论”的出现为从不同角度批判身份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汇合点:他们认为,身份政治压抑了群体内部的差异,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其他差异。^[14]“酷儿理论”的兴起与性别研究的新发展反映了女性主义理论由单一的“两性”研究转向“性别身份”的多元研究发展趋势,是相对松散的生活方式取代身份建构模式的身份分散化的过程。

社会性别研究的另一新议题和新视角——男性研究,则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男性的暴力、父权文化、亲密关系等问题。由于性别理论中女性和男性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社会文化在对女性进行规范的同时,亦规范男性。由此,女性主义男性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规范的历史变化及特定历史文化中的规范场所。

1990年代末,女性主义甚至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提出多重主体位置论、主体社会关系论、矛盾主体位置论、异体合并杂交主体论等几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话语,试图用“社会身份新疆界说”来包容复杂多元变易的关于社会身份等概念。^[15]女性主义理论不断调整与修正自身,在关注多元文化与身份差异性的研究中,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男性研究、酷儿理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研究模式,但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变成一个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失去意义的东西。

少数民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也是近二十多年来活跃于西方学术界、教育界、政治界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正日渐冲击着传统西方女性主义概念的内涵。该理论在少数民族群体、弱势群体和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承认”和“平等”等问题上做了多层次研究并提出了种种要求,认为“不承认”社会弱势群体是霸权主义与不公平的新表现。在性别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者找到其天然盟友——女权主义,共同向传统父权制和男权话语系统发起进攻,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差异性,使得他们保持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文化特色。

多元文化主义重视差异性,主张以相互尊重与容忍的态度来面对差异,肯定亚文化、异文化、不同族群文化的价值,重视不同文化、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差异。然而文化多元性理论最复杂的问题即怎样在一个群体的水平上改善对差异的宽容,即怎样保证容忍能够扩展到对群体存有异议的个体。这一问题要求寻求这样一种新的处理文化多样性途径——保护群体,同时又使个体逃脱群体的支配以改变群体。

女性主义就多元文化研究而言,必须避免陷入后现代消解的漩涡,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建立一种使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多元主义的差异与女性主义批判完美结合的女性主义文化,既能从性别视域对科学文化与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加以分析,从而使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继续发展。^[16]

参考文献:

- [1] FISHER L. Gender and other categories[J]. *Hypatia*, 1992, 7(3): 173.
- [2] KELLER E F.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LLOYD G.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M]. London: Methuen, 1984: 104.
- [4] 吴小英. 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7.
- [5] 罗钢, 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6.
- [6] [美] 桑德拉·哈丁. 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 夏侯炳, 谭兆民,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1.
- [7] 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32.

(下转第 24 页)

① “酷儿”(queer)一词起初是“同性恋者”、“违规”的代名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有意疏离主流、彰显边缘身份的政治姿态。在女性主义理论中,“酷儿”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指称,包含了所有在性倾向与主流文化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既包括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也包括其他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的性倾向者。